

[文章编号] 1005 - 1597 (2011) 04 - 0036 - 09

首次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揭析

■ 梁化奎

[摘要] 1936年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首开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之先河。此前主要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共思想和组织的制约,以及遵义会议前中共领导核心的不稳定、不成熟,而一直没有举办过此类纪念活动。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举办抓住了当时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出现的有利因素,组织筹备充分,纪念形式多样,纪念主题高度关注现实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纪念活动中还产生了几个极具政治表达功能与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念文本。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在中共党史上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一些现实启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是我国除国庆节外最具规模效应、影响力、历史延续性和意义承载价值的重大纪念活动。可是,这一纪念活动究竟起于何时、缘于何由?首次纪念活动是如何组织运筹的?有哪些纪念方式?规模和效果如何?对后来这一纪念活动的开展又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湮而不彰,尤少见系统缜密的爬梳研究。

一、1936年前没有举办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原因

从现有资料看,中共诞辰纪念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936年。不过,对于纪念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中共却是早有认识。据对1922—1927年登载在《向导》和《新青年》上有关纪念文章的统计,其中涉及到的纪念对象已有19个。^①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一项议决案中提出,要把汇编附参考材料的“各种纪念日宣传大纲”,作为中央宣传部“应急”开展的工作之一。^②1931年4月,中共中央针对苏区的宣传工作作出决议“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③这一时期,由于纪念活动的作用日益被放大,甚至

在苏区出现了“把纪念活动主观化、理想化”的问题,“让人感到中共纪念活动不仅无所不在,而且无所不能”。^④但换个角度看,这恰又表明纪念活动作为一种能够产生希望中的共同行动的政治象征,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成为中共经常使用的一个战术上的方法。

对于1936年前中共没有举办过纪念自身诞辰活动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党在成立后即投入到了紧张的领导革命的斗争之中,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没有可能组织统一的纪念党成立的活动。^⑤但上述事实说明,这样的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从对历史的深入解读

① 参见童小彪《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④ 童小彪《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⑤ 参见黄德渊《“七一”纪念活动的由来与党的“先锋队”问题的提出》,《党史博采》2003年第9期。

看，笔者认为，其中关键的原因，是由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关系决定的。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自此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中共解除了对于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中共即提出，中共的产生和发展，“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是曾经有过重大作用的”，然而，“要由一个国际领导中心来集中地解决一切国家的各种问题，是如何不可设想”。^①在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的认识评价中，周恩来在1960年7月曾说过，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的24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②。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产生和发展有过积极贡献，但在其一味强调高度集中的组织结构框架下，中共的成长和发展也曾因此受到种种制约和影响。

国共合作之初，陈独秀即对共产国际对待中共缺乏平等精神的做法，表达了不满。他在写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中说，共产国际代表“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③。对于这种不满，斯大林却采取了十分轻视的态度，并在写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要求中共“建立党务顾问制度”，所有党务顾问都要“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认为“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④随后共产国际不断强化了“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⑤的政治理念，由是造成中共不能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

与一般意义上的纪念活动不同，一个政党组织举办纪念自身诞辰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自觉、自我主体意识提升的表征。可以说，纪念活动组织举办的过程，亦即是自我主体意识被表达、被呈现的过程。但在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关系背景下，中共显

然是不可能举办这样一个在内在逻辑上必然是要充分肯定自我、彰显自我的纪念活动的。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说“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⑥他还说，遵义会议前中共的历届中央领导都“很不稳定”、“很不成熟”^⑦。所以，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思想和组织的限制，制约了中共自主意识的生发；另一方面是遵义会议前中共领导核心的“很不稳定”、“很不成熟”，中共很难形成自我主体意识。这种情状直到共产国际七大后，伴随着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出现的有利因素，方才创造了突破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旧模式的条件，也为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契机。

二、举办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国际契机和国内因素

上世纪30年代初，德国法西斯势力在欧洲迅速崛起，日本法西斯势力则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因此面临着巨大困难，这促使共产国际领导人不得不认真检视其过去推行的“左”的策略和政策。1934年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必须转变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策略。在此背景下，1935年7月25日至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45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301页。

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409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9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1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8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大会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任务，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是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各国共产党可以“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形和特点”，“迅速地、独立地来正确地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决议还提出，应当“改变宣传鼓动的方法”。^① 据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取消了向各国共产党派遣全权代表和顾问的制度，改为同各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联系。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在大会上得到了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威廉·皮克称誉中国红军“享有不朽荣誉”，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榜样”和“范例”。^② 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季米特洛夫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③ 在这里，季米特洛夫用了“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意味着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就为中共举办庆祝自身诞辰的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国际契机。

另一方面，从大革命失败至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其间党的力量曾遭到极大削弱，一度有濒临覆灭的危险。但是那时中国共产党人正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④ 他们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

和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使中国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希望，坚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莫斯科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12月17日至25日，中共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后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他还强调说，“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这就是说，“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⑤ 这些坚定而自信的话语折射出中共正在走向政治上的成熟。

对于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表现，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曾给出了这样的描述和评价：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习材料》（三），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63年编印，第26—27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39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

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其间，“国内外敌人曾认定中国共产党要彻底失败。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像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付，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①中共在险恶环境中的顽强存在和发展，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也赢得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敬重。这使中国共产党人深感自豪并备受鼓舞。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正确、光荣和伟大，更加珍爱自己的奋斗历史，从而更自觉地肩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这是组织举办党的诞辰纪念活动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上述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出现的有利因素，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和自我主体意识。在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尚未恢复通讯联络之际，身处国际共运中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无疑最先把握住了上述有利因素并迅速对此作出了反应。一方面，他们需要对新形势和环境作出分析和评估，以便重新确立党在历史中的方位，明确新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在肯定自我成绩的基础上，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说明中共在新的阶级关系下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先锋队的必然性，进而选择那些能够产生希望中的共同行动的各种象征，来提高党的政治威望特别是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的领导威望。

三、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筹划过程及现实诉求

共产国际七大后，根据新的组织分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负责处理中国问题，其书记处机关秘书处由1名中国问题政治助理（米夫）、2名中国问题顾问（瓦西里耶夫和克雷莫夫）、1名秘书（康生）等共12名工作人员组成。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季米特洛夫直接与中共代表联系。^②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尚未恢复直接联络之际，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地位明显提高了。1935年12月23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出一份“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其中提出“为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做准备”，并列需要准备的内容与人员分工。包括：出版系列纪念性小册子；在中国各阶层中调查对中共的看法；出版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报纸和杂志。人员分工则涉及到王明、李立三（李明）、陈潭秋（徐杰）、潘汉年（博林）、郭绍棠（克雷莫夫）等。这份工作计划中，还安排在3月22日由康生汇报关于纪念中共成立活动的准备工作。^③这样在1935年底，组织举办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一事，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6年2月2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交了一份关于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其中提到：在筹备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过程中，应当让在美国出版的《先锋报》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国际范围内调查、征询各界人士对中共的看法，并将答复后的调查表汇编出版，“以便更加提高我党的政治威望”。同时还建议：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出版党内已牺牲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的文集，以及现时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单独文集，“以便更加提高我党作为中国人民在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袖的威望”。^④这里明确指出了举办纪念活动的目的和现实诉求，即在于更加提高党的政治威望，尤其是在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袖的威望。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②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6页。

^③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73—74、77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22—123页。

3月4日,米夫也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共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再次强调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上述四项建议。其中说到“要有步骤地揭露敌人把我党说成是阴谋者集团的企图。要利用一切机会证明,共产党人是最忠诚的爱国者和为人民群众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先进战士。例如,为此目的应当在中共成立15周年之际(1936年6月)好好筹备并广泛开展群众运动。”^①

3月5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共同草拟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草案中提出,应当很好地准备并广泛开展与中共成立15周年有关的群众运动,出版一批有关党史概述、中共烈士和党的著名领导人的传记。同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写信,提请审议上述草案,并建议将其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或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以待“供中共中央批准”。^②信中还开列出一份关于开展纪念中共成立活动的详细计划。提出“6月中,要在中国境内外开展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如在莫斯科出版中共历史概论、中共烈士和党的杰出领导人的传记和文集,出版多种语言文字版的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杂志专号,组织一系列的会议和报告;在其他国家,各兄弟党要举办声援日或声援周,在党报上发表纪念中共成立的文章或短评;另外,将上述材料寄给中国各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和各报刊编辑部,等等。^③

3月27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上述指示文件再次提交了一个“补充建议”。其中提出,委托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精心准备并广泛开展一次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1936年7月)的群众运动。在此日期之前出版一套中共党史论文集、烈士以及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记,出《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专刊,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出专号,同时保证为国际共产党报刊提供相关的资料”^④。至此,有关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

组织领导、活动主题、纪念规模和形式等,已准备就绪。

6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通过了由王明和米夫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决定》。该决定提出:(1)中共成立15周年的庆祝活动推迟到8月7日举行;(2)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8月1日前筹备出版多种语言文字版的中共党史概述的小册子,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文集,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略文集;(3)《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编辑部要在8月1日后出的最近一期上发表3—4篇纪念中共成立和专论全民抗日任务的文章;(4)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组织一些兄弟党给中共发贺信,并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举行群众声援集会;(5)责成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校长,为学生组织举办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系列报告,或是举办内部展览。^⑤1936年7月25日,巴黎《救国时报》发布消息说“党中央已议决于本年8月7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在全国各地筹备举行庆典。”^⑥这则消息显然来自上述决定。《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决定》的批准通过,标志着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开启。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43页。

②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50页。

③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53—154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88页。

⑤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07—208页。

⑥ 《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四、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形式、纪念文本及其政治表达

纪念活动的开展，需要借助一定的具体形式。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综合运用了多种纪念形式，而且在纪念活动中还产生了几个极具政治表达功能和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念文本。

(一) 召开纪念会。关于这个纪念会，目前能够看到的文献资料，仅是陈潭秋在纪念会上所作报告的讲话提纲。由陈来作纪念报告，不仅因为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要成员，更因为他是当时在莫斯科的唯一一位曾参加过党的成立大会的中共党员。对此陈在报告中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代表团因为我是参加过党的成立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要我作关于党 15 周年纪念的报告。”陈在报告中指出：中共现在已经是共产国际除联共（布）外最优秀的支部，在民族命运悬于一发之际，我们“应当更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深刻的研究党的斗争历史和目前新政策”。^①

(二) 发表社论、发布消息及给中共中央发贺电。创办于 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作为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主要宣传党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在庆祝中共成立 15 周年之际，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社论。并发布消息说：“党中央已议决于本年 8 月 7 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纪念，在全国各地筹备举行庆典。”1936 年 8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去贺电。贺电中说“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之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谨向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致以热烈的祝贺。”^② 贺电正文部分，基本上是季米特洛夫当时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一文的内容。

(三) 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纪念活动中，《共产国际》中文版第 4—5 期合刊、俄文版第 14 期、英文版第 44 期，以及在巴黎

出版的《救国时报》、《全民》月刊第 7—8 期合刊，分别以专栏的形式发表或转登了一些纪念文章。如季米特洛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王明的《为自由独立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唐古（曾山）的《广州起义的回忆》、施平（陈云）的《中共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李光（滕代远）的《井冈山的回忆》等。季米特洛夫在纪念文章中指出：中共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它同时担负了双重任务：即在苏区它是“掌握政权的党”而在不断地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中国其他区域内，它在秘密条件之下又组织领导着群众的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在艰险困难的环境下，中共能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政治力量，“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不屈不挠地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等原因。季米特洛夫在文中重点阐述了中共现时面临的任務，指出了实现党的政策转变的途径和方法。^③ 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发表在 1936 年 8 月《共产国际》中文版第 4—5 期合刊上。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中产生的这一纪念文本，目前也是党史界公认的最早翔实地记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细节经过的珍贵历史文献。

(四) 出版纪念丛书。1936 年 7 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成立 15 周年纪念丛书。其中包括由米夫撰写的概述中共党史《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分工撰写的《烈士传——纪念我们为中国人民

^① 《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3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0—65 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5 卷，第 245 页。

^③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7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5 页。

解放奋斗而牺牲的战士》一书。米夫的小册子《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出版后，一度被视为是“引人入胜的”、“广为流传的第一部中共简史”。^①米夫在这个小册子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群众有着紧密联系”，“始终坚定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不愧称为民族英雄”，“实为中国最优秀青年之菁华”。^②《烈士传》一书收录了从五卅运动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牺牲的25位烈士的传略。该书前言部分是一篇题为《纪念我们英勇牺牲的先进革命战士》的文章。文中写道：在纪念党的15周年之际，“我们深刻地忆念着追悼着我们光荣牺牲的革命战士”，“所有他们的名字，都是与中国人民及共产党伟大斗争的历史，永远不可分离的；而他们一生的丰功伟业，更是千古光辉的。不仅他们的生平事业，我们永远可歌可泣，就是他们的气节风格亦可为一切革命者永久模范”。我们纪念死难的战士，“正是要在抗日救国的神圣旗帜之下，承继他们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发扬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革命经验，踏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迈进”。^③

五、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特点、历史地位和作用

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史上，它是唯一一次高调、高规格在海外组织举办的纪念活动。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之所以出现在当时国际共运中心莫斯科，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一年又八个月的通讯联络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发去了“第一号电报”，7月6日中共中央收到王明的回电，自此双方的通讯联络方才恢复。这时，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已在莫斯科开启，因此没有能够在国内同步进行，这就使得此次纪念活动在地域和受众范围上不能不受到一定

限制。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地是在海外，它又十分有利于塑造中共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扩大中共所实行的新政策在海外的影响。

第二，此次纪念活动于1936年七八月间进行，并没有提出中共诞辰纪念日的确切日期。《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决定》中提到的8月7日，是说纪念活动“推迟到8月7日举行”，并没有说8月7日就是中共诞辰纪念日。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时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④将7月1日定为中共诞辰纪念日由此被提了出来。同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下发的《关于纪念抗战一周年和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的通知》中说“我们决定从七月一日到七日为‘抗战周年纪念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⑤随之，“七一”一词开始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又过3年，即1941年6月，在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七一”一词被首次写进了中央正式文件。自此之后，“七一”遂成为全党例行的节庆纪念日。

第三，组织举办纪念活动的主体的政治身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特殊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为这一纪念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

① [苏] M. C. 贾比才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张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② 《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550页。

③ 《烈士传》（第1集），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1936年版，第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⑤ 王自成、任中和主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93年编辑），中央档案馆馆存，第165页。

和举办者，其主体政治身份虽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驻机关，但从当时它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看，其动辄以“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或是发布消息，因此它作为纪念活动的主体的政治身份显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时，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通讯联络的情况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言辞、话语和姿态，明显带有是在代表中共最高层讲话或行动的性质。另外，在整个纪念活动的运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参与和指导几乎是如影随形，这就更增加了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组织举办者的主体的政治身份的模糊性和特殊性。

第四，此次纪念活动留有“左”倾后遗症影响的印记。如米夫在写到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即文过饰非、推诿责任地说，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背叛革命，“共产国际是及时预告了中国共产党的”；“由于共产国际的正确策略，方保证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异常重要的胜利”。^①为了突出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和形象，米夫吹捧说，斯大林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起着极大与显著的作用”，“不深刻研究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著作和言论，要想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是不可能的”。^②如此等等。纪念活动存在的这些局限，自然会对纪念效果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

历史地看，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尽管有一定局限，但无论是在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史上还是在中共党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首先，它首开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之先河，开创了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传统。自此以后，规模不同、形式多样的党的诞辰纪念活动在中共历史上从未间断过。另外，它高度关注现实问题，凸显了这一纪念活动的首要品质；它组织筹备充分，纪念形式多样，活动中还形成了几个极具政治表达功能与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念文本，这为后来这一纪念活动的组织开展，以及纪念传统的形成、纪念文化的建构奠定了重

要基础。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中共的‘成立’，即指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中共‘一大’是后来才被赋予超越实际的象征性意义的”。准确地说，“中共‘一大’是被成为执政党的中共赋予了特殊意义的”。^③但事实是，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正是以中共一大作为党正式成立的标志来加以纪念的。陈潭秋当时更是明确地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告终，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生产而呱呱堕地了”^④。石川祯浩的观点与历史实际并不相符。

其次，它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妥善处理自己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政党文化建设的角度讲，它也是中共的政党文化建设从外来移植的生搬硬套，过渡到内生自发的自主建构的一个重要标志。纪念活动中，通过对党的奋斗历史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总结回顾，向世人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不畏艰险和牺牲，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息的崇高形象。这种对“自我”的肯定和彰显，尤其是对党在险恶环境下能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政治力量的有力回答，实际上即是对“自我”与“他者”之不同所作出的一种区分，它表征了自我主体意识的增长。这一政治意蕴在其后党的诞辰纪念活动中，越来越鲜明地反映和体现出来。周恩来在1937年7月1日党的诞辰纪念会上所作的《十六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即对“自我”与“他者”之不同作了深入区分。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像欧美那样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

① 《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497—499页。

② 《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07—508页。

③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264页。

④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9页。

直到现在,“我们还找不到像欧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拥有部分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对立,也找不到像中欧东欧那些自称为代表农民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或像俄国的社会革命党来与中国共产党对抗,这不仅是由于环境的不可能,也是由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接近群众,最能为群众利益而奋斗”。基于此,周恩来指出“承受着十六年头的的光荣传统,学习着十六年来的革命教训,中国共产党员应该自负的自觉的担负起目前的伟大的历史任务——领导全国反日统一战线的任务。”^①

第三,它高调宣传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这一纪念主题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直接关系到中共其后的发展。围绕着这一纪念主题,纪念活动通过举办纪念会、发表社论和纪念文章、出版纪念文集等形式,深入揭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明确回答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目标和现实诉求。由是增强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促进了各党派力量的整合与各方关系的协调。《救国时报》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载体,曾刊发了纪念社论、纪念文章和消息。据吴玉章回忆:在国内销行约万余份的《救国时报》,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不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43个国家,拥有9600余订户。^②借助这一媒介载体,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及其揭举的纪念主题,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树立了中共在国际、国内的良好形象,扩大了中共及其所倡导、实行的新政策在境内外的影响。

第四,它把纪念活动同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应变能力有机地联在一起。此次纪念活动,不仅深入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要加强和扩大党在群众中的联系和影响、争取党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改进党在党员中的教育等具体任务,而且强调了应当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地研究党的斗争历史和目前的新政策,并把建设一个巩固的党看作是克服困难、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值得关注的是,纪念活动中,还编辑出版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功绩。这对于增进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无疑会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从而为实现党的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

综观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认清世情党情,明确历史方位,在充满挑战的政治空间中,抓住有利时机,高调发出自己的声音,唤起人们的政治自觉,把纪念活动同党面临的紧迫任务、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同加强党的建设和树立党的崇高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纪念话语始终透露出一种创造历史的激情。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当代价值,或者说党的诞辰纪念活动超越时空之魅力所在,正体现在这些方面。

(作者梁化奎,徐州工程学院教授,江苏徐州221008)

(责任编辑:樊宪雷)

① 《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3期。

② 参见吴玉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